

话是：‘要贴到人物来写。’”（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）。

后来写《大淖记事》，小锡匠十三子和巧云相爱，被打重伤，只有灌陈年尿碱才能保命，“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”之后，汪曾祺忽然加了一句，“不知道为什么，她自己也尝了一口。”他坦言，“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。只是写到这里，出于感情的需要，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（写这一句时，我流了眼泪）。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解”（《〈大淖记事〉是怎样写出来的》）。

《七里茶坊》里写掏粪，“平地上晒着许多薄饼一样的粪片”；《受戒》“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，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，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，都是正经人”，最后一句简直是神来之笔；写家乡拾字纸为生的老白，“年下，给他二升米，一方咸肉。老白粗茶淡饭，怡然自得。化纸之后，关门独坐。门外长流水，日长如小年”（《故人往事》）；更痛快淋漓的，“梔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梔子花说：‘去你妈的，我就是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！’”（《人间草木》）。疏疏落落的长短句，顾盼有情，既干净熨帖又百无禁忌，还略带粗口，恰当的词句在恰当的地方。抛开情节，语言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摄人的美。

客观说，先生身上的“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”有几分天成，更多是阅历浮沉之后的积淀。汪曾祺早年吸收很杂，钟爱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，追伍尔芙的意识流，也看弗洛伊德和萨特，古文的底子来自私塾诵读，常



上图：汪曾祺和施松卿。

喜桐城派，尤其是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等篇。在西南联大以博杂、偏科、散漫、任性著称，喜欢的课爱不释手，体育、英文却是一塌糊涂，为此还留级。阴差阳错，认识了华侨之女施松卿，后来的老伴。早期的《复仇》《鸡鸭名家》《异禀》，华丽，犀利，也有恨气。

写家乡客来昆明开小饭店，“扬州人老板，一看就和别的掌柜的不一样。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”，又来了一位南京伙计来做包子面食，“脑袋剃得光光的，后脑勺挤成了三四叠，一用力，脑后的褶纹不停地扭动。周身上下，无一处不像一个当行的白案师傅”，两人抵牾，结尾颇有欧亨利式惊讶，“扬州人南京人原来是亲戚”，情感上竟然是恨：“对这个扬州人，我没有第二种感情：厌恶！我恨他，虽然没有理由”（《落魄》）。哪里是恨，哀其不幸啊！

建国后，汪老辗转各地，终和夫人在北京团聚。散文、剧本和小说都尝试了，京剧剧本《范进中举》还获得了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，但大环境终不允许。戏剧的底子让他成为革命样板戏的领军人物，执笔沪剧《芦荡火种》，主笔京剧《沙

家浜》，成就了红色经典。我小时候看春晚，常常醉心《沙家浜·智斗》，觉得唱词好，两面三刀的气氛也好，阿庆嫂“沉着机灵有胆量”，一句“我有心，背靠大树好乘凉”被借来去哄班上笔记最好的同学。

晚年的汪老恰似新春，沉静自如、圆通融和，作品如雨后春笋。早期的飞笔凌云，中段的齐整贴切、起承转合都淡去了，无论是回忆的散文，还是小说，自然而然流泻而出，一点不见斧凿。六十岁写《受戒》，反而活泼俏皮，“闹半天，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！”像装在银罐子里的清泉水，清澈明快。写饥荒、写“文革”也是，笔墨淡淡，情绪幽幽，《皮凤三榷房子》里的鞋匠高大头，挨完批斗后回家修鞋，生意还特别好，“‘文化大革命’期间人们好像特别费鞋，因为又要游行，又要开会，又要跳忠字舞”。讥讽中带着些温和笑意。

人格的魅力

悲中裹着怜悯，是文字，也是性情。“大跃进”时候萧胜“一直跟着奶奶过”，后来才知道“奶奶是饿死的。人不是一下饿死的，是慢慢地饿死的”“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胜的妈妈忽然站起来，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，又从柜子里取出一瓶奶奶没有动过的黄油，启开瓶盖，挖了一大块，抓了一把白糖，兑点起子，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。”“萧胜吃了两口，真好吃。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，大叫了一声：“奶奶！”

“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，一边吃黄油烙饼。他的眼泪流